

发挥社队和农民办学的积极性

《昆仑》(文学双月刊)1984年第四期发表了袁厚春的报告文学《省委第一书记》，这篇报告文学中的主人公是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同志。作品第五章“我们可能做了件大好事，也可能是犯了个大错误”，集中表现了他探索民间办教育之路，为振国兴邦敢于“走钢丝”的精神。现摘登如下。

“教育经费非增加不行！”高扬到河北来一个月之后，就向全省的县以上各级书记们发出呼吁：“如果明年我们手头稍为富裕，科学和教育（包括卫生）事业费应该大幅度增加；否则明年也应该从各方面挤出一些财力物力，治疗科教卫生单位的‘贫血症’。还一还历史积累下来的‘欠帐’。多年来怪事多端，其中之一是各方面的浪费惊人，唯独对科学教育事业舍不得花钱，讲‘节约’！”

在邢台县浆水中学里，他看了那些门不象门、窗不象窗的学生宿舍，十几个人挤在一张大通铺上；校长和教师住的八平方米的屋子，一张床，一堆日用杂物，再加上一张桌子就没有转身的地方了。“这是宿舍还是办公室？”他问。校长说：“……都是。”就是这样一所破破烂烂的学校，恢复高考以来，在地区从未出过前三名。

“你们是八十年代的学校，三十年代设备……”高扬沉重地对老师们说。

“农村中小学教育的落后，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，有辱社会主义名声的地步！这样下去，我们是没法向农民交待的！”他说。

教育质量低的原因在哪里？一曰教师水平低。水平低是因为待遇低，地位低，“养不住大鱼”。……二曰办学条件差。进村不用问，没门没窗的就是学校。……不少地方仍然是“黑屋子，土台子，泥孩子”。——钱，都需要钱哪！实际上，省里的教育经费每年都在增

加，1982年比1981年增加了15.9%，仍然是杯水车薪，无济于事。——单靠国家，三年五年是还不清历史“欠帐”的。

高扬在严峻的现实中奔走，在教育现状的“死胡同”里寻觅。他发现了矛盾！发现了一个怪现象：这几年农民一天天富裕起来，农村里到处盖新房，唯独学校破破烂烂！……他看出来，听出来了：土地、山林承包了，学校可是国家包办的，他们觉得把钱花在教育上是扔在井里了……

道路无非是两条：要么等国家富裕了再办，结果将是继续耽误这一代人；要么把学校交给群众自己办……何去何从？农村中的先进分子已经在探索新的道路了。高扬在获鹿调查时听说，城北三十里有个李村，1978年，大队筹措了几万元，想改善一下陈旧的大队办公室。女支书张新香，冒着大雨把干部们领到学校，指着滴答漏雨的教室说：“我看咱干部再凑合几年吧……”于是，他们当年动工，花十几万元盖了一座标准的教学楼。又拿出三四万元招聘教师。李村的教学面貌立刻改观。象这类群众和社队自愿出钱办学的事，各地都有发现。

是改革政策，改革制度的时候了。

高扬从廊坊、坝县、大城到保定，一路酝酿着，回到石家庄后，2月26日，立即伏案疾书，提出了《关于办好农村中小学的意见》，

(下转第19页)

工为主，以就地销售产品为主，以中小型规模为主。以自有资金为主。在我们已经给予借款扶持的20个项目，基本上都符合以上要求。由于“船小好调头”，市场信息灵敏，产品适销对路，因而效果较好。如重庆市井口农场1983年根据市场情况，调整水果加工厂的产品生产，制作多种汽水、汽酒、小香槟等饮料，仅此一项就盈利126万元。

三、在资金上支持。在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开始阶段，国家财政给予适当扶持是必要的。1979年重庆市成立农工商联合企业后，为了支持全省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发展，在1980—1983年省财政安排了有偿无息借款150万元，结合农场的包干结余，帮助农场或联合企业兴办以果、茶、奶等食品加工和酒类、饮料为主的重点项目，逐步形成了以食品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。目前，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已从1979年的45%上升到60%左右。

在财政给予资金扶持的同时，帮助农垦企业管好用好企业的各项资金，也是财政部门的

重要任务。1979—1983年，我省农垦企业包干结余达4,518万元，其中提取的生产发展基金就有2,623万元，成为农场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主要资金来源。但是，有的企业不注意经济效益，造成浪费。如有个县的园艺场1980年在省财政支持下办起了水果罐头厂，两年盈利40万元。他们对留场的包干结余资金怎样使用缺乏周密考虑，上了几个并不急需的项目，把钱花光。当罐头厂需要扩建时，又无资金。我们注意了这方面的问题，在每年的工作安排中，都强调财政部门要帮助企业充分考虑产、供、销各个环节的平衡，即帮助企业对原料物资供应、设备技术、交通运输、市场销路、成本价格以及利润率和投资回收率等进行可行性的论证。确有把握的项目，需要财政扶持的，我们采取重点现场审定，逐个签订合同的办法。农场必须保证合同的执行，不履行合同规定的，财政有权取消该项目并追回投资。财政部门支持发展生产的资金，我们都采取有偿方式，有借有还，以取得支农资金的更大效果。

(上接第15页)

共八条改革建议：把农村小学、初中划归民办，即分别由农村社队负责办；教师工资由社队发放，不论采取哪种筹款形式，总之要保证提高教师的实际收入；腾出国家教育经费集中改善高中、师范、农中、其它职业中学和示范性初中，以及补贴贫困社队的中小学；对教师实行定期考核、淘汰和招聘制度。……

这是一项带根本性的改革。

这是一个大胆的建议。

非同小可。全省每五个人中，就有一个是在校中小学师生；尤其在广大农村，这项改革将牵动几乎每一个家庭的利益。一旦改糟了，改乱了，影响所及，将是全省规模的关乎政局的骚动……高扬慎之又慎。

“八条意见”与群众一见面，人们才发现，原来这几年随着农村经济形势的变化，早已蕴蓄着强烈的“办学热”，而今一经点破，这

股热情突然喷发出来，在广大的农村形成了一派从未有过的红火热烈的景象。农民说：“耽误庄稼是一季，误了孩子是一代。钱花了可以再挣，误了孩子可买不来。”七十一岁的老农民杨保合，说得更干脆：“甭看我没孩子上学，每年为教育拿个百八十的没问题。”

到1983年9月，获鹿县各社队已建成教学楼11座，正在备料筹建的有28座……这是改革之前单靠国家拨款十年也做不到的！

“我们可能是为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；也可能是犯了个大错误……”在教改试点的初期高扬这样说。后来在常委会讨论通过“八条意见”之后，他对到会的同志们说，“如果错了，我首先负责！”

不错，任何改革都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，都要承担风险。但是一切一仍旧贯，还需要我们革命家，需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！